

第一章 启蒙运动与社会学的传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社会学的传入

一、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学传入中国是与中国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需要相联系的。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英国打败，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败。自从 1842 年订立南京条约起，封闭的中国大门被列强的炮火打开，中国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进入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于 1851 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又一次失败，订立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瓦解。

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促逼下，加重了对人民的封建剥削，在繁重的旧捐税上又加新捐税，以填补对外赔款和鸦片贸易的亏额。自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剧变，旧的财政、经济、政治、礼教等各种制度愈益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的枷锁。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从 1850 年的太平军起义到 1873 年陕甘地区回军的被消灭，在

这二十余年中，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规模空前巨大。人民起义虽说先后被镇压下去，但都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镇压过太平军的洋务运动派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福州、广东、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民营工业，初步形成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和商人转化过来的，既与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又受‘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限制，尽管如此，但是，其力量非常软弱。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刺激下，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逐步走上了政治改良的道路。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给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以机会来反对官办、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从而在政治上产生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从封建统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一批初步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维新变法改良运动的主力，他们追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于是，到了 90 年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社会动荡时期，西学东渐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近代文化转变。

维新派是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和启蒙文化的传播者，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就是这样一些代表人物。他们想走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强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而要维新，则只有学外国。当时的改良变法维新思潮，为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他们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梁启超的《时务报》受到启蒙。他们读新书，学西学，积极参与变法维新。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从 1888 年到 1898 年先后 6 次向皇帝上书，力图让皇帝相信：“尝考太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上清皇帝第四书》）他所说的‘穷理劝学’就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文化。戊戌政变前，改良派首先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

会政治学说引入中国，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作舆论准备，从而为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康有为领导的改良运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但主要还是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倾向，因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企图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力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以求得国家的富强。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上书中列举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又请皇帝读《泰西新中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其自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考》。他在《日本变政考》序中说，日本学习欧美，前后花了30年时间始获成功，中国地广人多，如果就近学习日本，10年之内就能成为世界强国。光绪帝迫于国内外的形势，接受了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这个运动到1898年发展成为“戊戌政变”，达到了高潮，光绪帝1898年6月下诏实行新政。但当时的国际条件绝不能允许中国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帝国主义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勾结起来，确立了强大的政治统治，任何改良必然遭到他们的严厉打击；再者由于改良派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相脱离的。他们要维新，又怕人民革命，幻想依靠帝国主义。因此，戊戌变法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了。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的悲剧而告终，但其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作用和深远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社会学就是在启蒙运动中被引入中国的。维新派的主要人物运用历史社会学论证改良的必要，及改造中国的社会与培养人才的方法。

二、维新派与社会学的传入

(一)寻求变法的思想依据

1. 维新派在西学东渐中传入社会学

19世纪末，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变革的要求。要求变革社

会的思想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龚自珍、魏源提倡“经世致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直到洋务派办“洋务”，都表现了变的要求。从早期王韬、郑观应等的改良思想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维新变法，都希望当政者能学习西方和日本，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先是学习其坚船利炮，然后是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企图保持中国的伦理纲常不变。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洋务运动破产，使中国人认识到，在学习西学时，不但要学习其自然科学，也要学习其社会科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被介绍到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维新派以进化论为理论根据，提出要“自强保种”，拯救国家危亡，就必须变法维新。

也正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已从创立阶段进入形成阶段。西方社会学，既是资产阶级批判黑暗的中世纪的产物，同时又是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矛盾丛生之中，需要分析、管理、改良这个社会的产物。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尚未成熟，但也需要这样的科学。

社会学创始人、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把社会学概括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并建立了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其中有关社会秩序诸因素相互作用及维持平衡的思想、社会发展的思想以及认为宗教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思想，都适应了中国维新派的需要。

继孔德之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把孔德提出的理论完整化，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两大主题是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这两种理论对中国维新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代表著作《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和《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都被较早地译成了中文本。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并且认为只能从社会及“集体意识”出发研究社会事实。他还重视研究社会结构，研究如何使社会稳定、平衡，如何实现社会整合。

这些社会进化论、有机论、平衡论及从集体意识出发的理论等社会思想，都对中国维新派的变革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西学东渐已成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在这一潮流推动下，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中西学交流架起桥梁的就是以今文学派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他们托古改制，吸收西方的社会科学成就，尤其注重引进社会学。今文学派既是儒学的一支，又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思想活泼，比较容易接纳西方的观念。今文学派是新旧混杂，中西融合的学派，它在传统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内容。今文学派的代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不但是学者，而且是政治家。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鼓吹变法，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强调创新和通经致用，力图把中西结合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变革，使其成为近代地主资产阶级挽救危亡、主张变法的理论根据。社会学就是在为维新变法寻求理论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被引入中国的。

2. 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变易思想相结合：历史社会学的形成

维新派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以西方进化论和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为理论武器，论证变法维新，以求国家的独立、自强和发展。他们融合西方的进化论和中国的变易思想，形成了社会学传入中国初期的中西思想混杂的社会哲学或历史社会学。

中国古代哲学已具有朴素的变易观念，如《易传》说“革去故鼎取新”；《韩非子》说“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公羊传》提出“三世”变易观；《淮南子》和张衡所著《灵宪》提出宇宙生成论；柳宗元认为由榛莽而封建而郡县是历史变化发展趋势的思想；王安石说“新故相除者，天也”；王夫之提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的“道”随“器”变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承认变化发展的哲学观念。这种变易观念虽然还不属进化论的思想范围，但为近代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前提。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虽对社会变革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在中国社会崩溃、国家危亡之时，在阶级与民族矛盾深重的形势下，一面总结中国社会的历史，一面向西方学习，接受了进化论。他们相信和坚持事物发展进化的观点，肯定自然和社会的进化发展，以此作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是当时正在转化而又还未独立成熟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之企图走改良主义的政治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而西方社会学的渐进说正好适应了维新派改良的需要。社会学成了一种变法维新理论，成了培养维新人才的社会科学之一。

康有为首先在自然观方面接受了进化论，并在万木草堂向学生们讲授人类进化知识。他创造性地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将中西社会学说融合在一起，借公羊三世说的“微言大义”，在其著作《人类公理》（后来改为《大同书》）中，阐述了进化的社会历史观，认为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前进的。这种社会进化观，从根本上打破了数千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统治思想，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依据。《大同书》中还较有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理论，其中包括了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民主制度、国家问题、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等。但是他只承认“渐变”而反对突变，因而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的变革。

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说群自序》），这里的“群”，指的是人群、社会。他指出“群”是天下之公理，万物之公理，同样“变”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他说群的目的在保国保种，方法是提倡联合黄种，君民同治，以孔教为国教，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外国侵略者及买办洋务派；变的目的是变政体，方法是废科举，开学校，改官制，实行地方自治。他对社会的存在和社会变革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他还明确指出“群学”即“社会学”，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之学。他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并应

用于论证变法。他所宣传的变法理论和政纲，在戊戌以前对维新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社会学”与“人群学”，如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格致学沿革考略”“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三文中，就直接提“社会学”之名，并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将“人群学”与史学、政治学、生计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并列。该文还在“社会学”一词下，加注“人群学”，可见“人群学”就是社会学。梁启超十分重视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这也说明社会学是适应中国社会改良的需要而传入的。

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谭嗣同也积极宣传“日新”的进化观点。他在《仁学》界说中说：“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夫恶亦至于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他认为“地球之道，自苦向甘”，人类社会沿着“逆三世”、“顺三世”的轨道向前进化发展。他在《仁学》中抨击封建伦常名教是“据乱世之法”，指出要维新变法，首先必须变革三纲五常。他在反封建的同时，竭力提倡自由、平等、博爱，鼓吹人道主义。就是在这部启蒙著作中的第一篇“仁学界说”中，他提到了社会学。《仁学》是最早采用“社会学”一词的著作，成书于1896年，1899年始刊于《清议报》。《仁学》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谭浏阳全集》第4册《仁学》）。谭嗣同认为要研究仁学必须精通社会学，说明他对社会学已有相当的认识。

传入社会学的先驱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著名论文“原强”等文章，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进化论观点。1898年又译述了J. 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其中加了许多按语，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积极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主张中国必须改革，走西方国家的道路。

中国近代思想家、社会学的先驱之一章太炎，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吉丁思的同类意识论很赞赏。他翻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就综合了这两家的学说。他自著的《馗书》中所论及的都为匡时救国而非说不可的问题，内容上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广泛，对中国古代各时期、各流派的思想都有所阐述，并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了对比，提出了从政治到经济制度的社会改造设想，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人口、语言、文学、心理、宗教、风俗等社会问题。章太炎早年在“原人”“原变”“菌说”等文中，也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自然观。他一方面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巨大影响，并认为恶劣的环境会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另一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合群”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同命运抗争，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这些维新派代表人物有不同的观点，尽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宣传启蒙思想，他们都把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社会学传入中国早期的社会哲学或历史社会学的特点。下面就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逐一加以介绍，以说明社会学传入时期的特点。

3. 康有为的大同书及其社会改良思想

(1) 社会进化三世说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组织与领导者。他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进化论，论述社会的变化，同时把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易相结合，论证变法。他在 1895 年闰五月初八上皇帝书中说：“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是非美恶，随时而易义。”他从对比中国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强弱，来证明非变法不可，这是就“势”而言。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他以这种新事物胜过旧事物的“物之理”证明变法维新是必然而必须的。

康有为认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周易》与《春秋》。他在

1895年应朝考的卷子上说,《周易》“专明变易之义”;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康有为发挥了《周易系辞》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他说:“如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故至变都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天时常在变,人也常在变。人“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心智万变,”“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社会也常在变,“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总之,康有为发挥《周易》的变易思想,论证社会进化和变法的思想。

19世纪后半叶,今文经学的再度兴起,成为维新派知识分子维新改革运动的一个合法依托。康有为就利用今文经学进行托古改制。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主要思想是孔丘受天命为主,为汉制法。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社会制度都是汉朝的儒家所制定的,集中表现在《礼记》之中。他们都假托孔丘说话,这就是“托古改制”。中国封建社会巩固以后,不需要改制了,公羊学也就没人提了。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封建社会动摇了,又需要改制了,一些想要改制的人就又抬出了公羊学。康有为所说的“变法”,就是“改制”,而为了说服顽固守旧的人们接受变法,他也要“托古改制”。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主要思想是“三世说”,即“所见”、“所闻”、“所传”的所谓“三世”。照董仲舒的理解,春秋历史分三个段落;照西汉时何休的理解,“三世说”是指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而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康有为也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有三个阶段。他在《论语注》卷二中说:“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维进化之理而为之”。这里,康有为虽沿用了何休的术语,但他把他的这种历史观应用到他的政治主张的各方面,从而使他的“三世说”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他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

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①“欧美大变”已至“升平之世”，而中国社会仍是旧制，即还是“据乱世”的制度，理应予以改变。但他也指出，变要因时。他在《中庸注》中说：“孔子之法，务在因时，当草昧乱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为升平而仍守据乱，亦生大害也。譬之今当升平之时，应发自立自主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当然，他所说的“变法”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人道渐化，皆有定位”“进化有渐，因革有由。”他特别注重“渐”变。在他看来，社会只应有渐变，而不应有突变；只应有改良，而不应有革命。这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它与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革命把社会进化与革命相联系的主张不同，也与后来的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不同。

康有为不但将三世说运用于论证变法，也以“三世”说处理种族问题。他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三中说：“据乱世为爱种族之世，升平世为合种族之世，太平世则一切大同，种族不分，无种族之可言，而义亦不立。”在这里，康有为企图以“合种族”之说来说模糊满汉民族界限从而缓和两族之间的斗争。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企图把董仲舒在公羊春秋中提到的孔丘神圣化，建立一个与基督教对抗的宗教组织。这一方面是出于他抵制西方列强侵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还是以封建正统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康有为说，中国本来就有一个教主，那就是孔丘。西方各宗教的教主都是靠迷信起家，而中国的教主孔丘是靠六经得到人们的信仰，孔丘才是真正的教主。他还认为，人类世界的文化日益进步，靠迷信起家的教主已逐渐不适宜为文明世界的教主，而以不迷信起家的孔丘才真正是文明世界的教主。这说明，在康有为心目中，以孔丘为教主的宗教，不但适合于中国，而且也适合于未来全

①康有为：《论语注》卷2。

球的文明世界。这就是说，康有为在发挥关于社会进步的“三世说”时，预测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

总之，康有为在《大同书》等著作中提出的“三世说”进化历史观，是给公羊派“三世”说的旧形式注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后，提出的一种新“三世说”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将从“据乱世”演变为“升平世”，再进入“太平世”。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据乱世”，应通过变法进入“升平世”。他的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该书还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论，其中涉及到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民主制度问题、国家问题、家庭和妇女问题等。

陈庆坤指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是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中国社会。他把进化论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礼运》小康大同说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他在《大同书》里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发挥他的‘通三统’、‘张三世’的理论。所谓‘通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所谓‘张三世’，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要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愈演愈进。他认为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而后再发展为民主共和，是历史的必然。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不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他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这就给封建顽固派所崇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以沉重打击，为他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①

(2) 《大同书》去苦界求大同的民主思想

1884年中法战争时，康有为开始酝酿大同理想，光绪十三年

^① 陈庆坤：“进化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891年版，第365页。

(1887) 编《人类公理》，这是《大同书》的前身；1901—1902 年写成《大同书》，之后又予以增补，于辛亥革命后发表一小部分，1935 年才全书出版。康有为空想的“大同”来自《礼记礼运篇》，他把《礼运》的“大同”与西方的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等糅合在一起，创立了空想的“大同”学说。

冯友兰说，《大同书》的“基本思想是从他的‘三世说’发展出来的。他认为，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升平’的阶段，比这个阶段更高的还有‘太平世’。他根据《礼运》大同章的理想，加上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一些社会改良的措施和理想，再加上他自己的主观希望和幻想写成这部著作。这部书的内容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也带有社会主义的空想。”^①

康有为在该书中认为，现实社会是不人道的苦境，并设计了一个与之对立的理想的“大同”境界。他把人类诸苦列出六类三十八项之多，即：“（一）人生之苦凡七：一、投胎；二、夭折；三、废疾；四、蛮野；五、边地；六、奴婢；七、妇女（别为篇）。

（二）天灾之苦凡八：（室屋舟船，亦有关人事，亦有关天灾者，故附焉。）一、水旱饥荒；二、蝗虫；三、火焚；四、水灾；五、火山（地震山崩附）；六、屋坏；七、船沉（汽车碰撞附）；八、疫病。（三）人道之苦凡五：一、鳏寡；二、孤独；三、疾病无医；四、贫穷；五、卑贱。（四）人治之苦凡四：一、刑狱；二、苛税；三、兵役；四、有国（别为篇）。（五）人情之苦凡八：一、愚蠢；二、仇怨；三、爱恋；四、牵累；五、劳苦；六、愿欲；七、压制；八、阶级。（六）人所尊尚之苦凡五：一、富人；二、贵者；三、老寿；四、帝王；五、神圣仙佛。”^②

康有为认为，在现存社会中，无论什么人都是苦的，而造成人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9 页。

②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大同书》，《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96—197 页

类诸苦的原因是九种分别。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①

既然“界”是一切“诸苦”的根源，那么，要脱离“诸苦”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去九“界”。他说：“何以救苦？知病即药，破除其界，解其缠缚。超然飞度，摩天戾渊，浩然自在，悠然至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产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②

康有为引伸了何休的“三世说”。何休认为，春秋的“衰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这就是说，中国的内部各诸侯之间还有界；而在“升平世”中国内部就没界了，但还有中国与外国之界；在“太平世”一切界都没有了，而是“大小远近如一”。康有为认为，去掉了“国界”，军队和监狱都不存在，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管理公共生产事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消灭了“级界”，没有等级之分，也无种族之别，无帝王、君主、世爵、贵族，无主无奴，男女各自独立，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家也毁灭了，男女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儿女由公政府抚养，人们生老病死之事“皆政府治之”；农、工、商皆归于公，人人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过着美好的物质生活；文教也很发达，人人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道德

①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大同书》，《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1—52 页

② 同上书，第 53 页。

修养，社会风气优良。

总之，康有为认为，去掉了九界，人类乃至众生就可以达到美好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独立、自由平等的世界。国界被取消了，全世界只有一个统一政府；各民族混合，只有一个民族；男女一律平等，家庭界限也没有了；农工商都为社会的公产；“不平、不通、不同、不公”的法律都被废除了；普爱众生，“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没有了。在这去众苦至极乐的大同世界中，人浩然自在，悠然至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①大同的社会原则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

《大同书》中的社会，从形式上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而其内容实质，则主要是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康有为所描述的“大同之世”，废除了家庭，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志愿结合的社会。这表明，他是要以个人为社会构成单位和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来代替以家族为基础和单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同时，康有为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而理想的社会还是“大同”社会。

（3）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富国养民之法

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前提，是以增益人的快乐为大同社会的道德，而他又将人的苦乐归结为脑筋与外物接触时感受的宜与不宜，适与不适。总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是以人道的原则和目的去苦求乐的，并且相信只有大同世界才是有乐无苦的世界，即所谓的“极乐世界”。因此，依他的观点，大同世界的实现是人类进化的必然，也是道德原则的当然。

那么，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大同世界呢？康有为认为，首先是靠人的“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人皆有之。他把这种“不忍”与

^①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2 页。

磁力、电力混同起来，称为“爱质”，而人类则要靠这种“不忍”的爱质来实现世界大同。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康有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一斑。尽管这些观点混淆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但其中也有接近唯物主义的倾向。

总之，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世界虽是空想的，但无疑也具有进步意义。其实现大同的办法，是幻想通过发挥人的仁爱精神，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大同”，而坚决反对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尽管如此，他的思想还是起了启蒙的作用，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为社会改良的实践提出了主张，而他的最大的事业是组织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

康有为胸怀全局，从 1888 年到 1898 年，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改革方案。在政治上，他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认为，中国如果就近学习日本，十年之内就能成为世界著称的强国。在军事上，他主张迁都，选将练兵抗敌，反对投降主义。他认为“变法”就是培养自己的实力，以为战争的后盾。在文化上，他要求废除科举，主张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并主张建立孔教为国教。在经济上，他要求保护和发

展民营工商业，大力推行机器生产，反对官办企业的垄断。

他认为，变法包括两大项内容，第一项是“富国之法”，第二项是“养民之法”。他在《公车上书》中说：“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这里所说的“开矿”、“轮舟”是他的产业政策，“钞法”和“铸银”是他试图解决当时社会上的经济问题和政府的财政问题的办法。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贫。”其中，他最注重的是“劝工”和“惠商”。他说：“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蔽矣。古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

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他认为，农商孰轻孰重，国家重农还是重商，并不是由于东西之分，而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到他那个时代，理应重视工商。他提出的“惠商”的办法是：“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他不主张国家自办商业，国家应鼓励和帮助私人合办公司，而不是代替它们。这些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多开厂多出产品，这样就会以商带工。而后康有为又上了《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务陈商务折》，分别说明劝工、惠商的意思，并明确工商的互用关系。总之，他不主张政府直接办工商业，这与曾国藩的“以政带工”、“以官代商”的政策根本不同。他认为政府可以做的事是为商业培养人才创造条件。

康有为把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注入到中国传统中的变易思想，由此提出的变革理论具有进步意义。他提出的具体变革措施，也是总结历史的实践经验的产物，在维新变法中起到了启蒙作用。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康有为幻想依靠仁爱精神，自上而下实现改良，反对社会阶级革命，最终遇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不过，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康有为是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先导。

4. 谭嗣同抨击封建君主制，宣扬仁学

冯友兰曾经指出：“康有为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为这个运动提出了一个总纲领，这个纲领的重点是政治上的改革。谭嗣同把改革扩展到道德上、思想上、文化上，并且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总的说明，这就把革命的范围扩大了，深度加深了。”^①

谭嗣同（1865—1898 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激进派，主要著作是《仁学》。《仁学》积极宣扬变法维新，在探求变法的理论依据的背景下，于 1896—1897 年写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6 页。

成，1899年由梁启超、唐才常分别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和上海的《亚东时报》上发表。《仁学》集中反映了谭嗣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它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社会学说，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及佛教思想，融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仁学》第一篇“仁学界说”第25条提到“社会学”（“社会学”的译名，最初采用的是日译法），这是中国最早先采用“社会学”一词的文献。

《仁学》一书的思想来源和组成十分混杂，谭嗣同在书中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仁学》全书凡50篇，分两卷。上卷通过阐发“以太”——“仁”——“通”——“平等”的道理，鼓吹“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宣传资产阶级平等、民主、自由思想，竭力提倡博爱，鼓吹人道主义。他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总称为“仁”。下卷通过对封建纲常名教、君主专制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激烈抨击，提出变法维新改造社会的主张。《仁学》实质上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推行改良路线的理论著作。

（1）抨击封建君主制及名教

谭嗣同从批判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出发，进一步批判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政体；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开始，进而批判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纲常名教。

谭嗣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批判，在当时是最激烈的。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的时代，当时的任务是打倒君主统治。他认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孔子后最有价值的著作。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是黄宗羲的有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启蒙思想名著。“明夷”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该书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